



戴家祥 学述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241
JX

浙江人民出版社
JIANG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戴家祥著 王文耀 整理

戴家祥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丛书策划:周游工作室
特约编辑:何梦祥
责任编辑:周向潮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育智

戴家祥学述

戴家祥著 王文耀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装 订 杭州长风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
字 数 11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4000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72-5/G · 461
定 价 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戴家祥先生与
王文耀先生合影



戴家祥先生著作《金文大字典》

14070/07

戴家祥學述

戴家祥先生手迹

目 录

MULU

戴家祥
学述

自 序	1
人生和学术	3
启 蒙	4
师 承	8
执 著	15
求 索	26
学术论坛	38
论王国维学术	39
论治学方法	54
论甲骨文字学	67
金文释读	89
总 论	89
释 字	102
读 器	134
附 录	143
年 表	145
著作目录	149
研究评介资料	152
后 记	154

自序

金文即青铜器铭辞，宋人谓之钟鼎彝器款识。其始见称于西汉张敞之读美阳古鼎，至北宋而称盛，有清一代，藏之者弥众，近五十年又有大量发现。

昔刘原父撰《先秦古器图》言其学术价值：“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谍次其世谥。”乾嘉已还，考据学兴，谭经者必及小学，攻小学者每及金文，时至晚近，此风更盛，金文研究在小学领域，可谓硕果累累，礼制谱谍或难见诸名家考释，然视文字学一途，瞠乎后矣。

余尝谓金文研究，事有三难，以言文字都出李斯同文之前，未可以《说文》执一求之，此一难也；铭辞作者每以音类相近假借为之，稍不留意，即失音义，此二难也；殷周至今，积年数千，制度因革，已非一代，仪注体式，名号各殊，策勋受赏，名物多异，其中成语，更难寻根，此三难也。更有一语之中三难俱在，穷搜博讨，未必即得，望文生义，谬种流传。制度谱谍之研究，受制于成语之遗缺，盖可知也。举例言之：

《仪礼·士虞礼》“夙与夜处，小心畏忌”。《齐侯铸》“小心畏忌”，《陈侯簠》“毕恭畏忌”，畏字均增心旁；《王孙钟》

畏增阜旁，《邾公华钟》“畏忌”又作“威忌”。

《小雅·六月》“薄伐玁狁，以奏肤公”，“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兮甲盘》“薄伐”作“各伐”，《不殿簋》作“广伐”，《宗周种》作“扑伐”。

《洪范》九“五福”：“三曰康宁”；《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金文宁作能。《齐侯钟》“女(汝)康能乃九事”，《毛公鼎》“康能四国”。

以上数例皆古成语常见于青铜器刻辞中者，不但与诗书所言文有出入，即各器铭之间亦非形声若一，倘不求读古文变异通例，与夫声韵转变通借之理，安知形声之间同条共贯，亦不可能使其语义涣然冰释。

难却林君在勇盛情，不辞毫耄，借门人文耀之力，编撰《学述》，略言家祥治学种种，厚望好学之士得之，冥而思之，有所收益，进而洞烛古文字之深义，揭示古传统之奥秘，发扬华夏文化之精髓，乃吾辈平生之愿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人生和学术

文耀按：家祥师一生耿介刚正，敢怒敢言，淡泊名利，古道热肠。格外看重师生之情，朋友之谊。正像他自己说的，“择友以志同道合为原则，从业随朋友去留，惟性所适”。少年时，曾题他的书斋“白鹄楼”诗二首：

一

瀚海黄河不耐秋，东风一夜锁红楼。
蛟绡结齿三更梦，瘦骨穷骸万里愁。
风瑟瑟，水悠悠，抛残锦字倩谁收？
幽禽漫说人间事，底事伤心只泪流。

二

落尽深红剩素枝，二年终日两相思。
沉沉蓟北春云换，黯黯蜀宫晓梦迟。
情脉脉，恨丝丝，冰魂隐约玉娇姿。
茫茫故国鹃声老，片影孤心欲寄谁？

诗由好友方介堪刻篆，其中的“片影孤心欲寄谁”句，真是旷古幽情的吐露，发自肺腑的“天问”。而他的一生正是对这个发问的圆满解答。

启 蒙

我生于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5 月 4 日（阳历），养于浙江省永嘉县上田乡（今瓯海区梧埭镇南一村）戴家，汉族。

祖父伯陶娶元配霞坊叶氏，继娶本县茶山乡诸氏（瑞安经学大师孙诒让的大姨），夫妇都死得很早，有一子两女。子名佩和，元配亦娶诸氏（为其母的同族侄女），婚后即亡。继配瑞安县海安（今场桥乡）竺雅周公长女采芹，生一女，女两岁时，佩和病故。佩和在其高祖的世系中为嫡长子，兄弟一辈尚未出世，更谈不上传宗接代的子侄。因此，诸、竺两个外家商量定策，教他的遗孀伪装怀孕。

这时瑞安县鲍田乡有个周姓贫农，长年在海涂中捕虾捉蟹为生，患胃病不治身故，遗下一子名崇水，年仅 6 岁，其遗孀已怀孕数月，只好带着崇水沿街乞讨。产后第十三天，以 35 元的代价，将新生儿（即我）出卖，由竺姓外家带进上田，冒充戴佩和的遗腹子。因我生父名庆桃，所以乳名余庆，在上田戴氏宗谱中属“瑞”字辈，谱名瑞暄，但在鲍田周姓，却属“崇”字辈，谱名崇郎，“出继上田戴氏”。这两个谱名虽然一直保留在各自的宗谱上，但是一直没有对外用过。

生母把我卖出后，改嫁场桥李殿庚，生子女各一。十多年后，殿庚贩卖私盐到永嘉，在路上患急性传染病死去。一

家靠崇水从事“非法”买卖，即所谓盐梟子过活。有时还借卖盐之便，绕道上田，偷偷地看一眼被卖出去的胞弟长得怎样？但机会是不多的。

戴家虽然拥有良田千余顷，但我在戴家却饱受养母竺采芹的虐待。她对待生女戴燕姑和养子我，态度悬殊，让我和老妈子一起睡在铺着草垫子的北屋里，盖着破棉絮，姐跟她却睡在南屋，床上铺柔软的毯子，身上盖暖和的新被。燕姑又借故向妈妈告伪状，我被妈妈打得鼻青脸肿是常有的。这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中，自使人一目了然。妈妈还在打骂声中每每话中有话，这就等于告诉人家，余庆非我儿也。

这时，担任上田初级小学校长的戴桂芬（京生），绰号“狂生”，是其高祖世系的二房大阿公，敢于欺侮寡妇孤儿，借修订宗谱为名，想把我排除出戴氏宗支之外，一次又一次地勒索去巨款，还不满足，终于告到公堂上去。他的官司虽然被驳回了，但在乡里间造成极坏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可能和其他适龄的学童一样，有资格进入初级小学，只好请教师在家里关起门来教读。第一个教师诸庆森，是个不学无术的鸦片烟嗜好者，把我取名戴家祥。第二个教师是一位年已 64 的瑞安人俞黼唐（君尧），其子名煦姓字春如，宣统己酉（1909 年）拔贡。第三个教师姓吴，名濬，字虞士，真正穷到没有立锥之地。年过半百，一家四口，住在瑞安司前卫城河木桥上搭建起来的一间不到八九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土名“桥棚屋”。以好学闻名，为当地士绅项荇甫先生所推重。他自己只有两个

女儿。对于我显得格外喜爱。用“和气致祥”的含义，结合谱名瑞暄，同时照顾到继父佩和的身分关系，字曰“幼和”。

吴老师从科举废后，便学会了英语、算术等新知识，又擅长国画，山水、花鸟、人物，样样都会。由于他一度把我从严重的赤痢病中抢救脱险，近邻十里左右的农民，才发现他是一个出色的郎中，求医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但他从不收受人家的分文谢礼。

1913—1915 两年内，我读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学会了笔算、珠算，同时还背诵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孝经》、《诗经》、《左传》，能写 100 字以内的短文章，对国画的基本功，也略有所知。

民国 4 年乙卯（1915）养母病故，曾祖父的侄儿（殿鳌的儿子）伯镛叔公管了我的家，不到两年，叔公也短命死了，年仅 39 岁。

养母死后，家产遭受亲戚房族和男女佣人们虫蛀鼠窃，渐渐走向破落，但是我精神上的压力却有所减轻。叔公死后，我获得更多的自由。1919 年，我敢于走出家门，参加五四运动的行列，散发字画宣传品。吴老师也意识到青年的将来，要靠从学校里取得资格，要我外祖（竺旦）允许我走出私塾。那些邻里读书的人，特别是我家后岸的王起（季思）一再怂恿我以同等学力去投考中学。1920 年秋季，以英语成绩优异，被教会学校温州艺文中学（校长英国人蔡博敏）录取，为第一名，后来又被瑞安县立中学录取，只是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名列备取第四。

瑞安是吴老师的家乡。县立中学的创始人，是姨公孙

诒让（仲容）和项苕甫先生。姨公虽已去世，他的二媳妇即孙次镠的夫人，又是我姊夫诸叔琳的二姊。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遂和诸叔琳、王起作伴借住虞池孙家，成为瑞安县中的走读生。同时有机会获得次镠先生的爱顾，允许走进他家藏书的“玉海楼”，翻阅姨公及其先人琴西公遗著。

姨公《古籀拾遗》自序：“光绪戊子（1888）同里周孝廉璪亦嗜篆籀之学，为手书以上版。”周璪先生字仲龙，那时还健在，对于我的拜访，破格接待。他对我讲起姨公的治学方法：以专带博，反过来又使渊博的知识为深邃的专精服务。同时讲到姨公晚年，每天以一支洋蜡烛为度，烛泪未干，手不释卷。

姊夫诸叔琳、同乡王起，都在一年后毕业回乡。我一个人似乎不好意思再在孙家住下去，但是感情上实在不愿意离开“玉海楼”。后来无意中碰到一位林铸（涤夫）先生，他当时担任着瑞中三年级语文课，和我并没有教和学的师生关系，谁知立谈之间，结成忘年之交。他主动地把我接到龙首桥他家去住，又把我介绍给他的表娘舅陈琮（燕甫）先生做受业弟子。

陈老师是个奇怪的知识分子，他在科举时代是个廪生，但是深爱天文、数学，所有几何、三角、代数乃至物理、化学，一看就懂，一用就会。生平嫉恶如仇，因被省立第十中学校长邵季达解聘，失业在家。这时又殇了一女倩姑，写《哭女诗》二十章，有“可怜一块心肝肉，冰雪含云化作泥”句，堪称一字一泪，精神上感到非常苦闷。涤夫先生介绍我

去,不是为了微薄的束脩,为的是使他老人家“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时人们打趣说:“林涤夫爱才如命,陈燕甫嫉恶如仇,戴家祥思学若渴。”陈老师见面时,赠我八个大字“勤能补拙,俭可养廉”。

陈老师每天清早,总要到教务处转一转,除英语、手工、图画外,他都能教,也不论什么课都能吸引学生。同学们望着他拿着点名册的身影,一哄“燕甫老来了!”便争先恐后地拥进课堂。我向陈老师学的主要是先秦文献。四年时间,计有廿二部子书,再加《论衡》、《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只欠黄帝《内经》,说他自己不懂。

陈老师和涤夫先生又都教我从师不如访友,介绍给我许多朋友,都是当地有名气的书法家、鉴赏家和教育家。

1924年发生军阀抢夺地盘的江浙战争,永嘉到福鼎都是戒严区域。我回家乡避难,阻隔了一个多月,不料涤夫先生已在中秋前夕,呕血身亡。他的老父雅琴公公,要我照旧住他家,不必拘束。不久,我中学也毕业了。

师 承

在列强入侵、北洋军阀执政的民族危亡之际,新文化运动所激起的振兴国学、追求光明的波澜,却吸引了无数壮怀激烈的青年学子。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当时有两大文化摇篮:一是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另一是弘扬国学的清华大学。

1925年，王起兄从东南大学寄来一份剪报，告诉我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约我一道去北京应试。我怕自己程度不相称，陈琮老师却鼓励我去，并为我写了一个证明，列举读过哪些古书，有什么心得体会，有什么专长，请准予按同等学力应试。所有好友，不论老的年轻的，也都尽情鼓励我。哪晓得那个所谓外祖父，却摇头不准，并且用经济制裁手段，捆住我的手脚。后来又受五卅惨案的影响，奉系军阀乘机南下，交通不能畅通，使我没有赶上第一期招生。1926年秋季，总算实现我的愿望，和王力、谢国桢、姜寅清、朱芳圃等兄，赶上第二期考试而被录取。这期仅招20名研究生。第一名是安阳谢国桢（刚主），第二名是温州刘节（子植）。去年第一名是息县刘盼遂，第二名是海宁吴其昌。当时清华园里就有“状元出在河南，榜眼出在浙江”之说。我当时名列第七。

因我平生敬佩王国维，这次一心投奔王先生门下。我先是从书本上认识王先生的。那还是在温州读中学时，我看到罗振玉编的《齐鲁封泥集存》，罗振玉在序中说到王先生时用“王徵君”的称号，因为清朝学部曾聘他做官，但他不肯去上任。“封泥”是古代竹简文书封口上的印章。竹简文书往往用绳扎紧，然后在绳的结头处用一块泥封牢，再加盖官印，用以保密。王先生对汉代封泥很熟。于是请他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分门别类，加以校订。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学问。陈寅恪因此说王先生是真正的古文家。

我早年读到王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是《观堂集林》，这是王先生在仓圣明智大学时的著作。仓圣明智大学在哈同花

园(现上海展览馆)内,当时只有树木、山石。哈同夫人罗伽俾,咸水妹出身。基督教徒姬觉弥看中哈同的遗产,巴结罗伽俾,二人出面办了这所民办大学。王国维先生当时住在文义路一大通路,在大学里讲仪礼。有空就去蒋孟平(字伯斧)家看书,帮助蒋孟平编《密韵楼藏书志》,蒋孟平就出资帮助王先生出版自己的学术论文《观堂集林》。我当时托熟人以八块银元的代价在上海买到一部。拜读王先生的著作后,愈感到王先生学问的深厚博大,对王先生的敬仰之情也日益增长。

开学前夕,王国维先生亲自召见学生。我恭恭敬敬地到了先生的工作室。王先生留着长辫子(清华园内独他留辫),身穿长袍马褂,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和蔼地问过我的简况,便耐心地听我自己的科研计划。王先生鼓励我专攻古文字学,这正是我平生之愿!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大纲是王先生起草的,采取旧中国的书院制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全国第一流的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每人配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月薪400元;讲师有李济、梁漱溟,每人也配有工作室,月薪100元,外加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给的300元,与教授收入持平。这批中华文化的精英正当盛年,最年长的梁启超才53岁,梁启超退出政界后,认为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否定太多,可能会后继无人,因而出山执教。李济、梁漱溟还不到而立之年。加上待遇优厚,因而他们尽心培育英才,使清华园呈现勃勃生机。

四位教授的讲课各有其特点。当时,每当王先生等授

课,不仅研究生,而且连本科生和大学助教也来聆听。王先生主讲《仪礼》、《说文举例》,用他研究的金文、甲骨文来证明许慎著的《说文解字》的错误之处,这对我的治学起了极为关键的启迪作用。梁启超主讲《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他也多次召见我,但往往自己滔滔不绝,不让学生讲话;他讲的《中国土地问题》肯定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陈寅恪主讲《西洋人研究东方学的目录学》、《金刚经》,他知识面太广,有些课学生难以听懂,特别是讲由印度梵文翻译的《金刚经》。不过,我经常陪王先生去陈寅恪寓所,听他们交流学术,受益匪浅。王先生很少说话,主要听你讲,也很少表态。如你讲得好,他就说一句“那倒很有意思”,如你说得有问题,他就摇头,或添上一句“怕不可靠”。到陈寅恪那里,他讲一半,学生讲一半。赵元任那里,学生去得比较少。李济主讲“考古学”。这位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在课堂上批评安特生的仰韶六期分法的见解。这种不唯权威是从的治学风格使我非常敬佩。

李济后去山西工作,一次回校带回考古资料 49 箱。在欢迎会上,李济老师首先说明,选择山西为工作对象的动机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第二天我特地向王先生请教,山西夏县究竟是不是禹都。王先生说:“那是搞错的”。“我国古帝都都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王先生又认为:“禹之都邑虽无考,然自